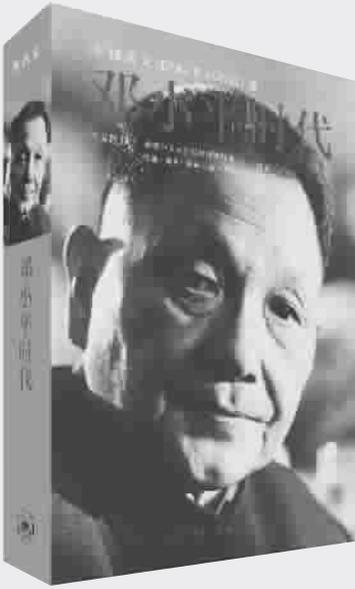


《邓小平时代》(节选)1

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
倾十年心力完成的巨著《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译校 三联书店刊行),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书中涵盖丰富的中外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为数众多的作者独家访谈。对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的幕后曲折、邓小平和诸多当时关键人物之关系、香港问题、邓小平南巡等重大议题均有详述及剖析,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本版摘录内容选自书中第四章:向前看,1975。



邓力群和于光远一样,同时还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

虽然邓小平掌握着全面负责党内事务的权力,但毛泽东仍让“四人帮”保留对宣传工作的控制权,以防邓小平偏离他的意愿。

事实上,江青也有自己专门的写作班子,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开会,总在伺机对邓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进行批判。江青的宣传工作难免与邓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发生重叠。

对于邓小平来说,文化领域的整顿需要改变大方向,这就需要重新赢得因“文革”而疏远的知识分子的心,把他们安置在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的位子上。因此,1975年政研室在加强科研机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战场。邓小平把李鑫调到政研室,就是因为他作为康生过去的秘书,控制着毛泽东的很多文稿;李鑫来政研室工作,强化了“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应由邓小平主管的理由。尽管胡乔木、李鑫、吴冷西以及政研室的另一些人是为“毛选”第五卷准备材料,但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个组织的保护。

打算收进“毛选”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论十大关系》成了争执的焦点。这是完成企业集体化和国有化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的一次讲话,讲话中的一些观点邓小平可以用来为自己在1975年推动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毛泽东说,中国在平时时期应当减少军费和国防开支,把资源用于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学习各国的长处。邓小平请求毛泽东批准重新发表这篇讲话。毛泽东看过打算重印的稿子后,建议做一些修改。邓小平将修订稿再次送呈毛泽东,并在附信中建议,鉴于这篇讲话对当前国内和外交工作的意义,宜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尽快发表。毛泽东再次退回稿子并做出批示说,应当把它送政治局讨论。当然,“四人帮”反对重印这篇讲话,毛泽东也从未同意将它公之于世。直到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不久,这篇讲话才在1976年12月26日重新发表。邓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后,政研室也于1975年12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只开过13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协助邓小平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前规划了长期路线图。它在恢复高等教育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拓宽了文化活动的空间,促进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1976年,它因为对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制发挥了作用而受到批判:(1)“工业20条”;(2)“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政研室在制定前两份文件上起了主要作用,但未排除其

他力量,第三份文件则由它独力承担。

中国科学院

1975年6月,邓小平把精力转向重整中国的科学事业。“文革”期间,在汇聚了大量高级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每250个科学家中就有一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150人中有一人死于非命。即使在社会上少数仍然维持运转的研究机构中,科研工作也受到极大的干扰。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中国科学院有106个下属研究单位,科研人员24714人。到1975年时只剩下13个研究所、2个研究室和2000多名人员,其中有1800名干部或科研人员,200名后勤人员。在1975年,很多下放农村的科学家还没有回来。邓小平、华国锋派出胡耀邦、李昌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包括选拔新领导、恢复科学著作的出版。因此,对科学界的整顿是从中国科学院开始,随后扩大到其他研究机构的。

邓小平亲自决定由胡耀邦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整顿工作。7月中旬,华国锋代表邓小平和党中央对胡耀邦说,他希望中国科学院在四个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胡耀邦首先要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摸底调查,把情况汇报给中央,然后搞一个整顿计划。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完成后,再整顿其他科研机构——隶属于国防部、分管经济的各部和地方政府的科研机构。之后要对学校和出版系统进行整顿。

胡耀邦率领一个三人小组,带着整顿的命令于7月18日来到中国科学院。他宣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科学院已经结束,工宣队和军宣队都要离开,中科院过去被下放农村的人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单位重新工作。要让科研人员获得必要的研究文献,包括外文出版物。

几周之后,胡耀邦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人员和各主要部委代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探讨中国在未来10年的科学技术需求。这些会议标志着向制定10年科学规划迈出的第一步。从8月15日到22日,胡耀邦又和相关的党委干部开会,讨论中国科学院的重建和主要领导人的选拔。他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在20世纪末实现包括科学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在整个9月份,胡耀邦与各研究所的领导开会,讨论如何克服他们工作中的具体障碍。

胡耀邦能够设身处地为受过罪的人着想,因为他和他们都是被迫害的幸存者。他帮助解决中科院人员的个人生活问题,例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把家属从农村调到北京。事实上,他指示各所的干部把全部下放农村劳动和“学习”的人员列出一份名单,绕开繁文缛节把他们调回来。他不怕替他们说话,为他们的事业出头。每次他在某个研究所讲话都会成为一件很轰动的事。他很快就成了中

国科学家群体心目中的英雄。

9月26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国科学院在拨乱反正、选拔新领导和恢复工作方面的进展,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10月4日胡耀邦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他上任之后为各研究所任命了三套领导班子:一套管党,一套管业务,一套管后勤。他尊重专家,明确表示业务上的事由他们说了算。该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胡耀邦正在为各研究所任命新的行政领导,政治气候一变,任命进程也随即停了下来。在制订中国科学院的整顿计划和为成立单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制订计划的同时,胡耀邦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着手制订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十年科学规划”。新规划的第一稿于8月11日完成。

它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1949~1966)取得的进步,在这个时期大约培养了15万名科技专家,但后来他们都被“四人帮”打成“资产阶级”科学家。规划说明了当前农业、工业和国防急需的技术,也谈到了发展尖端技术的战略,如计算机、激光、遥感、仿生学以及在核能、粒子物理和其他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担心毛泽东的反应,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集中在一起,以清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总的观点。他对撰稿人说,要肯定前17年的成绩,同时要少谈后来的问题。邓小平还说,文件的篇幅也要压缩。

邓小平让胡乔木负责修订工作。胡乔木在8月26日给起草人写了一份有关邓小平的意见的说明,然后监督了修订工作,他希望最后的文件能够更符合毛的要求。9月2日完成的第四稿不再提前17年取得的科学进步,改为讲新中国成立后整个26年取得的科学进步,这样就避免了批评“文革”。文件宣布,要在2000年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赶上甚至超过世界科技水平。

在9月26日讨论该报告的国务院会议上,胡耀邦讲话时,邓小平不断插话。胡耀邦讲到追上世界科技水平时,邓小平强调说,对中国目前的水平还是要谦虚一点,因为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其他国家太多。邓小平一再插话,反映了他要振兴中国科学的热情——他一再说,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一步。邓小平强调,要支持真正优秀的少数科学家,不要在意他们性情怪僻。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问题很重要:他们的孩子要送进好的托儿所,还在农村的配偶都应当允许调到北京。邓小平说,50年代他在苏联时就了解到,苏联原子弹的基础工作就是由三位只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完成的。邓小平批评说,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善待杰出的半导体专家黄昆,如果北京大学不用他,可以让他来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支持他的工作。

邓小平接着说,虽然他的法语和俄语说得都不好,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外语,以便能够阅读国外文献。他们也要学习科学理论,如果不懂数理化,不管有什么文凭都没有能力搞科研。他还替那些在“文革”中挨批但仍坚持做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辩护,说他们“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邓小平批评说,有些人甚至不敢提“专”字,在他看来,国家应当爱护自己的专家。中国要在工厂引进自动化,要支持能够从事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他知道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仍在持续,因此强调说科技人员也是劳动者。他指示说,“十年科学规划”经过修改后要送交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很少像在这次科学会议上那样激动,他不但不时插话,而且大力主张科研必须在“四化”中起带头作用。

胡乔木在9月28日把邓小平的讲话吸收进了第五稿。报告必不可少地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大胆宣布政治理论不能代替科学。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五稿。恰恰是在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应毛泽东之邀来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对邓小平及其在清华大学的整顿工作有意见。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续选见下周一、二、三)